

〔丹麦〕勃兰兑斯 著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一分册

流亡文学

张道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George Brandes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根据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英译本(1923)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2501-5

I. 十… II. ①勃…②张… III. 文学流派-文学研究-
世界-十九世纪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927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共六册)
〔丹麦〕勃兰兑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8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875 插页 12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14000

ISBN 978-7-02-002501-5 定价 115.00 元(共六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修订版说明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本社已于1980—1986年先后出版几位译者执笔的中文本，当时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过比较及时而必要的帮助。为了便于新旧读者系统阅读和收藏，我们今天将它重印并一次出齐，除将人名、地名予以统一外，对译文未作大的改动。

勃兰兑斯(1842—1927)，生于哥本哈根的犹太家庭；1864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1864至1871年漫游欧陆，在巴黎结识大批评家泰纳和勒南，及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尔等，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

回国后，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文学。为了帮助丹麦摆脱文化上的孤立状态和地方主义，他以革新者的热情宣传西欧政治文化传统。他为宣传进步思想和现代社会改革而写作，号召反对后期浪漫主义和抽象的唯心主义，本书就是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义。

他进而和现代文学先驱易卜生一起，共同提倡精神革命；并和北欧文化名流比昂松、雅可布森、斯特林堡等，共同领导了北欧文学的自然主义运动。为此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他被称为“不信上帝的犹太人”。

他的专著除《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外，还有不少传记，如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传，德国社会领袖拉萨尔传，丹麦剧作家霍尔堡传

等；单篇论著有介绍民族传统的《丹麦诗人》(1877)，推荐他所影响过的青年作家的《当代突破者》(1883)。后受尼采影响，提倡“贵族激进主义”(1889)，散见于其关于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恺撒、米开朗琪罗等人传记材料中。晚年所著《耶稣的神话》，树敌甚多。

由于认为文学是人类心理的反映，文学史即心理史，他视文学运动为一切进步和反动力量的斗争，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勾勒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所反映的人类心理的轮廓。从中可见，这些文学现象是由一个巨大的时起时伏的思想运动在主导，在左右；前世纪的思想感情在减弱，在消失，而进步思想在新浪潮中在抬头，在增强。虽然如此，也可以说，进步和反动势力在彼此消长中经常是互相渗透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更不是永远优胜劣败的。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由六分册组成：第一分册《流亡文学》，概述法国作家在卢梭思想的启发下，为了反抗暴政，纷纷逃离本国，到国外从事创作活动；同时，与当时尚在萌芽状态的反动相对照，“流亡文学”仿佛还能让人看见“一道颤动的亮光”。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指由于反动逐渐增强，脱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一些德国作家；也可以说，德国浪漫派的反动是上升时期的反动。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意味着斯塔尔夫人及其左右的一批作家以“感情”的名义开始的法国文学的反动，即法国复辟时期头几年的反动，应称为“胜利的极盛时期的反动”；反动的对象先是所谓“权威原则”，被抛弃的“感情原则”转而支持“权威原则”，使后者一度在法国文学领域受到空前的荣誉和崇敬；不久，“权威原则”摇摇欲坠，它的原来的维护者（从夏多布里昂到克吕德内夫人，从雨果到拉马奈），七月革命以前的伟大作家们，一个个转身向它宣战了。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检点最初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英国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在柯尔律治、骚塞、司各特、

济慈、穆尔、坎贝尔、兰多、雪莱等人身上各不相同的表现；在包罗万象的雪莱早年夭折后，拜伦“挺身而出，发出了他那惊天动地的吼声”。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毫不夸张地被本书作者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它人才辈出，个个跻身于先进之列。自不待言，雨果使所有同辈诗人相形见绌，缪塞甚至排挤了雨果，长期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还须知，戈蒂耶领导浪漫主义走向了造型艺术，巴尔扎克在心理学方面发展了浪漫主义，司汤达则在民族心理学或比较心理学方面，梅里美在历史方面，圣伯夫在自然主义的批评方面，各自发展了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每一方面，1830年这一代人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杰作。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部伟大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由海涅、伯尔内、古兹柯夫、卢格、费尔巴哈所代表，他们由于为希腊解放战争所鼓舞，特别崇拜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拜伦，为1848年大动荡做了革命精神上的准备，使德国的新文学运动在同年的三月事件中喷薄而出。此前从文学上看，发生了拜伦之死；从政治上，发生了希腊解放战争；这两件事开辟了欧洲大陆精神生活和文学的新时代。接着，1848年的欧洲革命暴风雨标志了历史的转折点，本书作为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叙述也就到此为止。

以上六个分册，法国文学占去六分之三，如果把流亡文学也算在内；德国文学占六分之二；英国文学占六分之一。这种分量上的比例，既可能反映了客观事实，也可能取决于本书作者个人的识见和价值观。作者勃兰兑斯在西方学术界的的历史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被认为具有“生动的智慧”、“不匮乏的求知欲”和“无可匹敌的审美鉴别力”；另一方面，他又被鉴定为“为前期精神所渗透的公认现代主义者，没有任何政治哲学的叛逆者，他的风格及其耀眼的才华基本上是保守的。”（参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一卷，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社）。不过，作者毕竟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人，我们拿二十世纪的观点来议论他，未必是公正的，正如

拿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套二十世纪的人和事一样。无论如何,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丹麦文学吹来一阵新风,以科学的批评方法代替了狭隘的传统的价值观,这才是今天仍然值得我国读者重视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2009年6月

出版前言

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名著，对欧洲，尤其是对北欧的文学运动起过巨大的影响，迄今仍是研究欧洲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作者由于本书及其它论著，曾被称为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

勃兰兑斯于1842年出生在哥本哈根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受过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熏陶，试图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调和知识与宗教信仰的矛盾，并以《美学研究》(1862)和《书评与画像》(1870)两书初步见重于文坛。1870至1871年旅游欧陆，结识当时一些文化名人，特别接近泰纳、勒南、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始从抽象的思辨转向实证主义的学风。1870年写博士论文《当代法国美学》，即着意传播泰纳的艺术原则。回国后在哥本哈根大学任讲师，主持美学讲座，热切引进当时欧洲新兴的哲学、美学思潮，力辟北欧弥漫一时的地方自大观念。他的这些划时代的、发聋振聩的讲义，凝聚了他近二十年的心血，后经整理成书，便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这部巨著。

本书把文学运动看做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概述了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法国部分到三十年代为止，英、德部分到二十年代和1848年为止)，着重分析了这几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过程，以及现实主义相继而起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本书没有把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看做“和周围的世

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自在的艺术品,而认为它不过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同样,也没有把某个国家的某些文学现象看做是孤立的、这个国家仅有的现象,而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被体现在相互影响的国家中的不同形态。此外,作者还把文学史看做是一种心理学,认为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如果它是“完整的”)来研究这个国家某个时期所共有的思想感情的一般历史。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并不是作者的独创,从中正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文学理论家(特别是泰纳、圣伯夫等)对于他的影响。

泰纳认为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这种艺术哲学在本书中得到了生动而又有创见的发挥。本书作者作为一个自觉的实证论者,主观上尊重经过“科学”“实证”过的事实,但是实际上,科学的作用有时被降低为仅仅记载事实,而事实则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他说:“我的工作便是追溯每一种心情、情绪或者憧憬,把它列入它所属的某一类的心理状态里去。”正是这样,他在分析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便往往把人物形象看做所谓“普遍人性”的某个方面(例如吝啬、贪婪、嫉妒之类)的体现者,而不可能把它同产生这一形象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联系起来,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其次,作者还承袭和发展了圣伯夫的艺术观,认为文艺作品不外乎是作家的自传,因此在本书的一些作品分析中,人物有时简直成为作家的自我写照,而情节则几乎等于作家个人经历的忠实复制。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作家在创作中所流露的自传成分,但是一言以蔽之的“自传说”显然低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和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此外,作者还像一般资产阶级作家和批评家一样,十分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个人的完全绝对的独立性”、“可宝贵的个性”等;因此,他对法国雅各宾党人的革命专政和拿破仑的第一帝国一视同仁地加以反对,而对于反抗这两次统治的“流亡者”夏多布里昂等人,以至继第一帝国之后复辟时期

的“思想自由”的鼓吹者，则寄予无限的同情。应当说，这些地方都不免背离了本书把文学运动视作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这一主导精神。

尽管如此，本书的优点和特色仍然是不可抹煞的。首先，它把西欧文学当做一个浑然的整体，从各国的文学思潮中清理出它的纵横交错的来龙去脉，使读者能够对它得出一个全局的观念，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构成全局的各个部分。它评议某一国家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即使为了达到前面所说的“自传说”式的结论，一般都能充分地联系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各国流派间的关系，以及作者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其它作品，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过程，读者即使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的结论，也能够更确切地判断这部作品所起的社会作用，并确定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尽管泰纳的艺术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本书作者却避免了泰纳强求事实服从原则的公式化倾向，而从丰富的相互联系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出发，分别引申自己的有关结论：这是有别于，也是他强似泰纳的地方。

作者撰写本书，还有更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促使丹麦和整个北欧醒悟过来，迅速摆脱文化上同欧洲大陆相隔绝的孤立状态。他在本书中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同胞：欧洲早已为天主教和浪漫主义所蛀毁，新的人物正在通过新的风暴发出新的声音，而丹麦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社会生活不过是在古老的精神废墟上苟延残喘而已。正是这样，这部名著一出版，便在北欧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为作者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如易卜生、比昂松、雅可布森等。这些“现代的开路人”在文学创作上共同抵制浪漫主义，促进现实主义，可以说一起领导了一场精神革命。然而，也正因为作者毫无顾忌地站在激进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 1848 年的欧洲革命作为历史的必然抱肯定的态度，并且斥责民族偏见和宗教偏见腐朽过时，这部名著又在教会和保守势

力方面为作者招致了一大批敌人。他们以“不信神的犹太人”的罪名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它卑鄙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

1877年勃兰克斯不得已移居柏林,到1883年才回国。1902年重进哥本哈根大学主持美学讲座。1927年卒于故土。

这位大批评家一生著述丰富,并能用几种文字写作和讲学。除《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外,他还有一系列关于丹麦和北欧文学的专著,如《索伦·克尔恺郭尔》(1877)、《爱塞伊斯·台格奈尔》(1878)、《路德维希·霍尔贝格》(1884),综述丹麦文学传统的《丹麦诗人》(1884)以及鼓舞和推荐他周围一批新作家的《现代的开路人》(1883)等。他的游记也是很闻名的,如《德国首都柏林》(1885)、《波兰印象记》(1888)、《俄国印象记》(1888)等,后两部有较大的篇幅涉及文学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品。作者还为同时代的政治人物(如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狄斯雷利)写过传记,并用德文写过一本《斐迪南·拉萨尔》(1877)。他还是《易卜生全集》德文版的主编人之一。晚年潜心于巨型的文化、历史名人传记,其中著名的有《莎士比亚》(1895—1896)、《歌德》(1914—1815)、《伏尔泰》(1916)、《恺撒》(1918)、《米开朗琪罗》(1921)等。去世前不久出版的《耶稣传奇》(1925),由于把耶稣写成一个凡人,更使基督教社会为之哗然,恨之入骨。

勃兰克斯学识渊博,目光敏锐,见解深刻,文字风格清新流畅,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他毕生又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大半生在思想上追求自由与进步,实际上没有摆脱欧洲资产阶级的传统精神,更没有达到人类已经达到的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先进思想水平。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暴力,同情进步的社会运动,晚年甚至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表示拥护,但始终没有建立明确的政治观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受到尼采思想的熏染,精神上反而日见孤立

和衰退,逐渐发展了一种貌似激烈、实则颓废的个人主义哲学,以致成为欧洲一些所谓“精神贵族”的偶像,这一点特别反映在1889至1905年间他的论文(见《尼采》,1909)及晚年的传记作品中。勃兰兑斯本人的思想变化,正如易卜生在晚年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变化一样,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需要他身后的文学史家们至少按照本书所运用的原则,到十九世纪末叶业已开始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去寻找原因。

但是,不论在作者本人的整个著述生涯中,还是在整个欧洲文学史的范围内,《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仍不失为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论点,对于我国学术界仍然有充分的借鉴的价值。远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向我国读者介绍北欧国家文学时,曾一再推荐过勃兰兑斯的理论成就;他还特地引用过勃兰兑斯慨叹丹麦在文化上闭关自守时的一句名言:“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招致了‘哑’来”^①,借以警惕一些人忽视世界各国精神遗产的错误倾向。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我们将逐卷出版勃兰兑斯的这部名著。鉴于本书内容浩瀚,包括法、德、英等不同国家的文学运动,我们邀请了几位译者分别按照英译本和德译本进行翻译。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过韩侍桁先生解放以前和以后出版的中译本^②,特此志谢。

编者

1980年5月

① 见《准风月谈》中的《由聋而哑》一文。

② 韩侍桁译《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解放以前曾由商务印书馆逐卷出版(未出齐),并由其他书店选印过个别章节,其中第1卷解放以后由本社重印过。

引 言

本书目的是通过对欧洲文学中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的探讨,勾画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轮廓。暴风雨的1848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①,因而也是一个分界线,对发展过程我只准备谈到这时为止。从世纪初到世纪中这段时期,出现了许多分散的、似乎互不关联的文学活动。但只要细心观察文学主流,就不难看出这些活动都为巨大的有起有伏的主导运动所左右,这就是前一世纪思想感情的减弱和消失,和进步思想在新的日益高涨的浪潮中重新抬头。

因此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反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这一历史现象有全欧意义,只有对欧洲文学作一番比较研究才能理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打算同时对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中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加以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对文学的科学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一头可以放大,一头可以缩小,必须把焦距调整适当,使它能纠正肉眼的错觉。就文学而言,迄今为止各国之间相隔仍然很远,以致从彼

^① 1848年2月法国发生有工人阶级参加的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力普,成立第二共和国,影响所及,其他好几个国家这年也都发生了革命。

此的成果中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要形象地说明现在或过去的状况,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狐狸和鹤》这个古老的寓言。谁都知道狐狸请鹤吃饭时把美味的食物都放在平平的盘子里,使长嘴的鹤啄不起多少东西来吃。我们也知道鹤是怎样报复的。它把它的佳肴都放在细长颈子的高瓶子里,它自己吃起来很方便,而狐狸尽管嘴尖,却什么也吃不着。长期以来各国都在扮演狐狸和鹤这样的角色。如何把鹤贮藏的食物放到狐狸桌前,把狐狸贮藏的食物放到鹤的桌前,这一直是文学上的一个大问题。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做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从美学上考虑,它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需把作者和创作环境当做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而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本书却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像“果”反映了“因”一样,这种特点在他所有作品中都会表现出来,自然也会体现在这一本书里,不对它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本书。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

这些互相影响、互相阐释的思想界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些自然的集团。

我准备描绘的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我

打算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来讲,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第一组是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反动由此开始;但这里反动的潮流还到处和革命潮流掺和在一起。第二组是德国半天主教性质的浪漫派,反动有所加强;它更加有力,更加脱离当代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斗争。第三组包括约瑟·德·梅斯特尔、处于严格正统阶段的拉马奈和在王朝复辟以后还是正统派和教权派支柱的拉马丁和雨果,他们代表了战斗的胜利的反动。拜伦和同代的一些英国人构成了第四组。正是这个拜伦引起了这部大戏的突然转折。希腊的解放战争爆发了^①,一股使万物复苏的清风刮过欧洲上空。拜伦英勇地为希腊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他的死给整个欧洲文艺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七月革命前不久,法国大作家中间的阵线发生变化,形成了法国的浪漫派,这就是我们的第五组,参加这个新的自由运动的有拉马奈、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等。这一运动由法国传到德国,在这个国家自由思想也取得胜利。我在《青年德意志》中论述的作家构成了第六组,也是最后一组,他们受到希腊解放战争和七月革命思想的鼓舞,像法国作家们一样,把拜伦的伟大形象看做是自由运动的领导力量。青年德意志的作家海涅、伯尔内、古兹柯夫、卢格、费尔巴哈等和同代的法国作家一道,为1848年的大动荡做好了准备。

^① 这里指的是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820年开始,直到1830年希腊取得独立。

一批珍贵的康倍尼花瓶在炉中烘烤；一座家神蜡像不经心被放在炉旁，开始融化。

它向炉火使劲抱怨，说道：“瞧，你待我多么无情！你使这些东西加固，却让我融消。”

炉火回答道：“这只能怨你自己的本性。至于我，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都是火。”

——海因泽^①

^① 海因泽(Wilhelm Heine, 1746—1803), 德国狂飙突进时期作家。

目 录

引言	1
流亡文学	1
一 夏多布里昂	6
二 卢梭	14
三 维特	19
四 勒奈	28
五 奥勃曼	41
六 诺迪埃	53
七 贡斯当:《论宗教》——《阿道尔夫》.....	59
八 斯塔尔夫夫人:《黛尔芬》.....	82
九 流放	96
十 《柯丽娜》.....	110
十一 向民族偏见和新教偏见的进攻.....	123
十二 对于古代的新看法.....	140
十三 《德国论》.....	152
十四 巴朗特.....	170
十五 结束语.....	180

流亡文学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大革命的伟大思想和种种事件播下的种子开初在文学中基本上没有成长起来。它们无法破土而出，因为两个破坏性的暴政，即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几乎接踵而来，横扫法国，使一切个人自由都被消灭了。前一个恐怖专政使所有政治色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公众舆论不完全一致的人，不是被吓倒、被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王室、教士和吉伦德派全都向它屈服，人们逃往安静的瑞士或是北美荒凉的草原，来逃避消灭了他们的亲人并威胁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后一个恐怖专政则迫害、囚禁、枪杀或是流放了所有不甘沉默的人（这种沉默只允许对皇帝的欢呼声打破）。正统党、共和派、立宪派、自由分子、哲学家和诗人都被这无所不轧的碾子所轧碎，除非他们愿意逃往四面八方，到帝国的边界以外去寻找藏身之处。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帝国正在迅速扩大，一口吞并了德国和意大利，它的大军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似乎没有地方安全，连逃到莫斯科都会被撵上。

在这两大暴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到瑞士、德国、英国或是北美，才能从事他的创作活动。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这个世纪的第一批法国文学家来自四面八方，其特点就是有反抗的倾向。我不是说这些人在某些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相反，他们常常